

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故事——

少年儿童抗日先锋

红缨枪是儿童团员的标志性武器，它代表着一个时代中国少年儿童的红色精神。

儿童团，指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少年儿童组织，现演化成少先队。按当时规定，7岁以上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都可以参加。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动员打日本；侦察敌情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帮助抗属做事情；学习生产不稍停”。儿童团以村为单位建立，受党支部或共青团、妇联领导。刘胡兰、董存瑞都曾担任过儿童团团长，雷锋和王二小都曾经是儿童团员。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引领下，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抗日儿童团迅速建立，动人故事层出不穷。

站岗放哨，保卫边区。战争年代，斗争复杂，前方抗敌，后方还要防止坏人破坏和捣乱。特别是在成年人忙于作战和生产的条件下，少年儿童在维护地方治安中，就成为了一支重要的骨干力量。站岗放哨查路条，是儿童团的首要任务。

临县曾有一名儿童团员，放哨时向一个陌生人盘查路条，结果被检查人员转身就逃，放哨儿童便猛扑上去，一边抱住大腿，一边呼喊搏斗，直至民兵赶到。后经审问，来人正是敌人派出的密探。为此县政府召开全县民兵大会，号召全县人民向这个儿童团员学习。据统计，仅1940—1941的一年间，兴县、文水、临县等地儿童团，就查获汉奸30多个。

巡城查夜，缉私禁烟。日据时期边区政府规定，边区范围内不允许赌博吸毒、倒卖粮食和使用银圆。因此在临县、岚县等地儿童团，还配合民兵夜守城、巡稽查户口，在缉私缉毒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941年

春天，晋西儿童团干部在兴县开会，陶安、杨笃藻两个小干部，发现有人用银圆贩卖牲口，就立即把牲口贩子带到了县政府。临县有位儿童团长李乐则和一名团员放哨时，发现有3个商人往敌人的据点贩粮，他们当即扣住了两驮子粮食，送到村公所。

儿童团员们在查赌、禁烟中也是积极分子。他们白天观察哪些人不好好劳动，夜晚就悄悄地侦查他们到哪里去赌博，待夜深以后以查户口名义直奔目标——静乐县娄烦村儿童团，一晚上没收两副麻将牌。河曲县儿童团，一年查获大烟土140余两，烟具150余套。

侦察敌情，造雷埋雷。利用年龄优势，协助部队侦察敌情，是儿童团的又一贡献。

日寇投降前夕，我军向离石某地的日军据点发起围攻，但因对内部情况不明，不敢轻易进攻。于是两名儿童团员便自告奋勇，化装成卖香烟的小贩深入据点进行侦查，掌握了敌人人数和武器装备情况，使我军顺利拿下了据点。“长大了就去打日寇！”这是边区儿童团的共同誓言。因此，辅助或参与军事活动，也就成了儿童团的重要内容。

据统计仅临南四个区，1941年就有2000余名儿童团员参加了大练兵活动。在操练同时，他们还向民兵学习了造雷、埋雷、起雷技术。交城县儿童爆炸组的8个组员，刚开始见到地雷都要躲得老远，后来都学会了造地雷、做引信。临南二区儿童，更是学会了埋地雷、跳雷、吊雷等多种技术。兴县二区石岭子的儿童团员们，在一次反“扫荡”中，还自己选点埋雷，阻击敌人，掩护了乡亲们撤退。为多造地雷，多炸鬼子，兴县有80%的儿童都参加了扫雷制药活动。

拥军优属，协助扫盲。边区儿童的拥军

优属工作也做得十分出色。

1944年10月4日的《抗日战报》曾作过这样的报道：我军某部因战斗任务路经离石某村，该村小学生听说部队来了，马上回家烧开水。部队进村后，学生们提着开水，把水碗摆在了桌子上。部队完成任务后，又返回该村住宿，学生们又帮助扫房子、烧开水……第二天又在村里募集37斤红枣、24斤核桃，慰劳部队……

兴县二区儿童，麦收时积极帮助抗属收麦子。五寨村的儿童们每年夏天都要给村里的9家抗属割草喂羊。儿童团员们的行动，使抗属们十分感动，他们常常写信鼓励自己的亲人在前线多杀鬼子。

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劳苦大众的扫盲学习，在全边区开展的识字运动中，少年儿童成为推动冬学的重要力量。已经入学的儿童挨门挨户进行宣传动员，没入学的儿童都成为上冬学的积极分子。儿童团还积极开展“小先生”运动。兴县四区冯家村有两个小学生，每天放学都坚持到冬学识字班教课，每人包一个识字小组，包教包学，从不马虎。由于儿童团员们的积极努力，全边区学龄儿童入学率有了很大地提高，参加生产，植树造林。为了战胜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边区军民掀起大生产运动，少年儿童在其中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儿童们组织变工，帮助大人进行生产。兴县二区胡家沟有一个30余名儿童组成的变工队，夏初给各家收麦37亩，秋天又收秋60多亩，摘棉花7000多斤。这个县的白改玉村，为了腾出壮劳力搞好秋收和翻地、打场等重活，所有儿童都参加了变工队，完成了全村摘棉花的任务。

儿童团还根据自身特长拓展副业，开展



红缨枪



儿童团帽子

大生产活动。高家村培训编草帽儿童30多个，先后编出草帽360多顶；兴县六区儿童还组织起来捻毛、纺线、打毛衣、织袜子，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大人们都夸奖说，小孩子还真能解决大问题。

此外，儿童团还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兴县不少村子的儿童平均每人每年都植树十几棵，用他们稚嫩的双手，绿化了边区的荒山。

边区儿童的生活是艰苦繁重的，但也是丰富和充实的。就是这些生活，使他们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和成长。其后有很多团员成为革命英雄，成为新中国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

(本稿件文、图均由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高宇峰提供)

重要贡献：革命征程中的思想灯塔

——晋绥日报社：艰苦岁月里的新闻坚守与时代担当之三

□ 袁志钊

宣传党的政策
凝聚革命力量

《晋绥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始终将宣传党的政策方针作为首要任务。在抗日战争时期，报纸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广大军民团结一心，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通过报道八路军在前线的英勇作战事迹、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经验以及抗日英雄的光辉形象，激发了广大军民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凝聚了强

大的革命力量。

在解放战争时期，《晋绥日报》及时传达党中央关于解放战争的战略部署和决策指示，宣传土地改革政策、动员群众支援前线等，为推动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报纸详细阐述了土地改革的意义、政策和实施办法，使广大农民群众了解到土地改革是为了让他们摆脱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获得土地等生产资料，从而积极投身到土地改革运动中，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推动土地改革
维护农民利益

土地改革是中国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晋绥日报》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46年，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逐步深入，有读者向《晋绥日报》投书，反映记者的有些报道失实。于是，1947年6月，《晋绥日报》编辑部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在该报开辟《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专栏，后来又刊出《关于“客里空”的检查》，希望读者大胆地揭发虚假的新闻报道及其作者。这场反“客里空”运动，对于维护新闻真实性、密切新闻事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都有着重要意义。

通过反“客里空”运动，《晋绥日报》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实际情况，及时揭露了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如部分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侵犯中农利益等现象，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和措施。报纸的宣传报道引起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推动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确保了农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切实保障。

培育新闻人才
传承新闻精神

《晋绥日报》不仅是宣传阵地，更是培育人才的摇篮。在艰苦的办报过程中，报社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如常芝青、甘惜分、纪希晨等，他们后来成为新闻业界和学界著名的新闻人。这些新闻工作者在《晋绥日报》工作期间，积累了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形成了坚定的新闻理想和职业道德。

他们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采写了大量真实、生动、富有感染力的新闻报道，为宣传党的政策、反映人民呼声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将在《晋绥日报》学到的新闻理念和工作方法带到各自后来的新闻实践和学术研究中，推动了我国新闻事业、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例如，甘惜分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新闻理论家，他在新闻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与他在《晋绥日报》

工作期间的实践经验和思想积累密不可分。《晋绥日报》所孕育的新闻精神，如坚持党性原则、坚持真实性原则、坚持群众性原则等，也通过这些新闻工作者得以传承和发扬，成为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记录历史瞬间
传承革命文化

《晋绥日报》记录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瞬间，成为传承革命文化的重要载体。刘胡兰的事迹和毛泽东的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就是在该报首先刊登出来的。通过报纸的传播，刘胡兰的英勇事迹传遍解放区，激励着无数革命志士为了实现理想和信念而英勇奋斗。

此外，《晋绥日报》还报道了晋绥边区军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许多重大战役、战斗以及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成就，这些报道不仅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也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如今，当我们翻开那些泛黄的报纸，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革命先辈们的热情与激情，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这些历史记录，成为传承革命文化、弘扬革命精神的生动教材，让后人铭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幸福生活。



吕梁故事